

Martha C.
Nussbaum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善的脆弱性


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

(修订版)

[美国] 玛莎·C. 纳斯鲍姆 著

徐向东 陆萌 译 徐向东 陈玮 修订

CAMBRIDGE

 译林出版社

Martha C.
Nussbaum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善的脆弱性

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
运气与伦理

(修订版)

[美国] 玛莎·C. 纳斯鲍姆 著
徐向东 陆萌 译 徐向东 陈玮 修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善的脆弱性: 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 / (美) 玛莎·C. 纳斯鲍姆 (Martha C. Nussbaum) 著; 徐向东, 陆萌译; 徐向东, 陈玮修订. —2版 (修订版).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9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ISBN 978-7-5447-7167-2

I. ①善… II. ①玛… ②徐… ③陆… ④陈… III. ①伦理学 ②古希腊罗马哲学 IV.
①B82 ②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0602 号

善的脆弱性: 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 (修订版)

[美国] 玛莎·C. 纳斯鲍姆 / 著 徐向东 陆萌 / 译 徐向东 陈玮 / 修订

责任编辑 陶泽慧
装帧设计 彭振威
校 对 蒋燕
责任印制 单莉

原文出版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30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2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167-2
定 价 15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导 读

人类生活的脆弱性与对正义的寻求

徐向东 陈 玮

纳斯鲍姆曾在一个访谈中说过：“成为一个好的人（good human being）就是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一种信任自己难以控制的无常事物的能力。”^①纳斯鲍姆在这里所说的“好的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甚至也不是康德所说的具有“好的意志”的道德行动者，而是一个勇敢地面对自己作为人类存在者的真实处境，不断地追求人所特有的价值的个体。《善的脆弱性》就旨在通过考察古希腊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对于运气与好的人类生活之关系的探究，来揭示人类生活的脆弱性及其伦理含义，并对当代伦理思想提出系统的批判反思。作为纳斯鲍姆的成名作，《善的脆弱性》为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起点，对于理解她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著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善的脆弱性》开始，到她后来出版的一些相关论著中，纳斯鲍姆为人的尊严的根据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观点（特别是康德式的观点）极为不同的理解，将情感联系和情感依恋作为人的一个本质特征，并由此对社会合作的目的和社会正义的目标提出了一种迥异于主流传统的认识。

^① Bill Moyers (1988), “Philosopher Martha Nussbaum on How to Live with Our Human Fragility” (<https://www.brainpickings.org/2014/03/14/martha-nussbaum-bill-moyers-world-of-ideas/>).

玛莎·克拉文·纳斯鲍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于1947年5月6日出生在纽约,父亲乔治·克拉文是费城的一位税务律师,母亲贝蒂·沃伦主持家务,同时也是一位室内设计师。^①纳斯鲍姆在韦尔斯利学院入学,二年级时因为对表演产生兴趣而退学,后来转而求学于纽约大学学习古典学,特别关注古希腊悲剧,并于1969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赴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并在1971年获得古典学硕士学位。当时,她已对古代哲学产生兴趣,于是便跟从古希腊哲学专家欧文(G. E. L. Owen)研究古代哲学并在197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然后留在哈佛大学古典学系任教。1982年,在申请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失败后,纳斯鲍姆离开哈佛转赴布朗大学任教。1994年,纳斯鲍姆加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并长期执教于该校,目前担任由法学系和哲学系合聘的“恩斯特·弗罗因德杰出服务讲席”教授,同时兼任该校古典学系和政治学系成员,并参与南亚研究委员会和人权研究项目的活动。纳斯鲍姆也是芝加哥大学比较宪政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协调者。

纳斯鲍姆是一位极为勤奋、思想活跃的哲学家和古典学家。^②她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对人类生活的核心领域(特别是社会正义)做出了深入细腻的观察和分析,在学术界和公共生活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多次被评选为“全球100位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以及“50位最有影响的在世哲学家”。作为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卓有影响的人物,纳斯鲍姆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她曾担任美国

^① 下面关于纳斯鲍姆的传记信息主要参考了两个访谈录: Robert Boynton, “Who Needs Philosophy? A Profile of Martha Nussbaum”, *The New York Time Magazine*, November 21, 1999; Rachel Aviv, “The Philosopher of Feelings”, *New Yorker Magazine*, July 25, 2016。

^② 对这一点的一个有趣论述,见 Geoffrey Harpham (2002), “The Hunger of Martha Nussbaum”, *Representations* 77: 52—81。

哲学协会国际合作委员会和女性资格委员会主席以及该协会设立的公共哲学委员会的主席，并在1999至2000年间担任美国哲学协会中部分会主席。她在1988年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长期担任理事会成员，2008年当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通讯院士。她也是人类发展与能力协会的创始人。纳斯鲍姆也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而被授予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奖励，其中包括布兰迪斯非小说类创造性艺术奖（1990年）、斯皮尔福格尔—戴蒙德斯坦因最佳论文集奖（1991年）、美国哲学协会亨利·菲利普斯法理学奖（2009年）、稻盛和夫伦理学奖（2015年）以及京都奖（2016年）。2014年，她受邀在牛津大学发表“约翰·洛克讲座”，成为哲学界第二位受邀发表这项著名演讲的女性学者；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选举她主讲2017年度“杰斐逊讲座”，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给予人文科学领域学者的最高荣誉。同年5月，她发表了题为“无能为力与责备的政治”的演讲。纳斯鲍姆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不少荣誉，例如纽约大学杰出校友奖（2000年）、巴纳德学院杰出奖章（2003年）、哈佛大学研究生文理学院百年纪念奖章（2010年）。鉴于纳斯鲍姆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公共影响，她被全球57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到目前为止，纳斯鲍姆已经发表了20多部著作、500多篇论文和评论，编辑出版了21部著作或文集。她的专著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论动物的运动〉》（1978年），《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初版1986年，修订版2000年），《爱的知识：哲学与文学论文集》（1990年），《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的伦理理论与实践》（初版1994年，修订版2009年），《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1996年），《为了国家：争论爱国主义的限度》（1996年），《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1997年），《柏拉图的〈理想国〉：好社会与欲望的变形》（1998年），《性与社会正义》（1999年），《女性与人类发展》（2000年），《思想的剧变：情感的智慧》（2001年），《隐瞒人性：厌恶、羞耻与法律》（2004年），《正义的前沿：残疾、民族性与物种的成员资格》（2005年），《民主内

部的冲撞、宗教暴力与印度的未来》(2007年),《良知的自由:捍卫美德的宗教平等传统》(2008年),《从厌恶到人性:性取向和宪法》(2010年),《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需要人文教育》(2010年),《创造能力:人类发展探讨》(2011年),《哲学介入:1986—2011年书评》(2012年),《新宗教不宽容:克服焦虑时代的恐惧政治》(2012年),《政治情感:为什么爱与政治有关》(2013年),《愤怒与原谅:怨恨、慷慨与正义》(2016年),以及与利维摩尔(Saul Levmore)合著的《暮年深思:关于退休、风流韵事、年老体衰以及遗憾的对谈》(2017年)。纳斯鲍姆的著作也为她赢得了各种荣誉,例如,《培养人性》获得美国大学和学院协会1998年度内斯著作奖,《性与社会正义》赢得北美社会哲学协会2000年度著作奖,《隐瞒人性》获得美国大学出版社2004年度职业和学术著作奖。

从这些著作的标题中,我们不难看出,纳斯鲍姆致力于探究这样一些核心论题:人性与人类生活条件,正义及其制度实现,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人文科学在学术界与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宽容。换句话说,她把理解人类生存状况、探究好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及其条件视为自己的终身使命。在从事这项研究时,她不仅将自己在古典学和哲学方面的学术训练与众多领域(人类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分析、法律,等等)结合起来,也把自己对于人类生活的细致体验带入对有关问题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中。因此,她的著作不仅在哲学上具有难以匹敌的思想深度,在情感上也具有极为丰富的感染力。

纳斯鲍姆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古希腊哲学、伦理学、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及法学研究。她不是一位生活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充满了深切关注,试图用自己对古代哲学和文化的重新理解和解释,来思考人类生活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伦理、政治和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究好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罗尔斯在一次交谈中告诉她,如果她有成为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她的职责。她在这个时期的生活经历,正

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进一步鼓舞和促成了这种使命感,而作为一位极其善于通过学术争论和交锋来表达和捍卫自己观点的学者,纳斯鲍姆也由此成为学术界一位极具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1993年,一桩关于男性同性恋权利的案子被上诉到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其中涉及这样一个说法:科罗拉多州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排除了男性同性恋者可能欲求的某些法律保护,因此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为了对这桩案件进行判决,法官杰弗里·贝利斯(Jeffrey Bayless)希望知道州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是否能够在“理性根据”的基础上得到辩护——也就是说,是否能够得到与宗教无关的世俗哲学论证的支持。哈佛大学行政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普林斯顿大学法哲学家罗伯特·乔治(Robert P. George)以及当时在波士顿大学访学的牛津大学哲学家约翰·芬尼斯(John Finnis)递交了一份极为详细的宣誓书来支持这条修正案具有理性根据的主张,而当时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政治哲学家斯蒂芬·马切多(Stephen Macedo)和在布朗大学任教的纳斯鲍姆则持有对立观点。在这场审判中,证词和誓言最终都聚焦在古典作家(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同性恋行为的判断上。纳斯鲍姆试图用自己 对柏拉图相关著作的解读来阐明古希腊人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并反驳如下主张:哲学史为立法反对同性恋者争取不受歧视的权利的做法提供了证据。在纳斯鲍姆提交的第一份文档中,她宣称:“在前基督教时期的整个地中海传统和文明中,同性恋的浪漫关系、爱慕和性行为都得到了高度尊重。……这种关系从来就不被认为是可耻的。……因此,在基督教传统之前,没有证据表明自然法理论将同性恋的性爱恋视为不道德的、‘不自然的’,或者不适当的。”^①在纳斯鲍姆与其对手的争论中,关键问题显然在于如何解释柏拉图在其著作中用来描述同性恋的那个关键术语“tolemema”。

^① 转引自Gerard V. Bradley (1994), “In the Case of Martha Nussbaum” (<https://www.firstthings.com/article/1994/06/in-the-case-of-martha-nussbaum>)。

具有天主教保守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芬尼斯认为，这个词意味着“罪大恶极”，因此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和《法篇》中将同性恋描述为“不自然的”(para physin)，而这就表明柏拉图是出于道德考虑而拒斥同性恋的。纳斯鲍姆在反击中指出，芬尼斯将古希腊世界中并不具有的东西“输入”柏拉图的文本中，学理上的解释并不支持伯里(Bury)在《法篇》的洛布译本中将“ton proton to tolemema”这个词译为“罪大恶极”，实际情况反而是，不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不曾对不涉及强迫的同性恋行为持有道德异议。^①纳斯鲍姆在这桩案件中提出的核心主张(她主张“tolemema”这个词是道德上中立的)在古典学家当中其实并未得到一致认可，贝利斯法官最终也决定不按照所谓的“理性根据”来进行判决，不过，她对这件事情的参与明确显示了她试图用学术来影响公共生活的决心和态度。这个想法其实多年前就初露锋芒了：1987年，在对艾伦·布卢姆的很有影响的著作《美国精神的封闭》的评论中，纳斯鲍姆指出，尽管布卢姆倡导阅读经典著作的传统，但他其实并未真正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反而竭力鼓吹大学人文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培养精英。正是对布卢姆的猛烈攻击让纳斯鲍姆首次引起了公众关注。为了回击保守主义者对大学教育和学术界提出的批评和挑战，她在《培养人性》中通过借助古代哲学传统(特别是苏格拉底和斯多亚学派)指出，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早就主张我们不仅是某个特定共同体或国家的成员，也是“世界公民”，因此我们不仅应当尊重家庭和我们所属的当地共同体，也应该尊重其他共同体和文化，因为我们都是具有同样能力的人类存在者。她详细考察了这个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发展——经由西塞罗和其他斯多亚学派思想家并最终在亚当·斯密和康德等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倡导和发展。纳斯鲍姆由此论证说，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

^① 参见Martha Nussbaum (1994), “Platonic Love and Colorado Law: The Relevance of Ancient Greek Nomos to Modern Sexual Controversies”, reprinted in Nussbaum, *Sex and Social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99—331。

的世界公民意识,多元文化主义本来就是苏格拉底自我审视的思想传统的一个支流。在《功利教育批判》中,她进一步发展了类似主张,表明人文科学(包括艺术)在所有教育层面上都很重要,对于培养和塑造批判权威的能力、跨文化理解的能力,以及从整个人类共同体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世上发生的复杂问题的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科学的教育之所以不应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应当成为一切教育的核心,乃是因为它是“成人”(特别是成为具有批判意识和民主意识,对整个人类充满同情的合格公民)的基础:“民主社会的健康乃至幸存取决于将公民培养为在重大问题上为自己而批判性地、严格地进行思考和判断的公民,他们广泛地思考所生活的世界及其历史、经济结构以及其中的各个民族及其互动,他们敏锐地想象,处于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人的处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①

纳斯鲍姆对待人文科学的态度表达了她自己对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基本观念的承诺,因此,对于反对启蒙运动思想纲领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她不仅很不以为然,也大张旗鼓地进行批评。她将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描述为“全然不值得研究”,认为其分析缺乏“认真研究的证据”;她批评福柯肢解历史、概念混乱。而在评论性别理论家朱迪思·巴特勒的一部著作时,她指责这位古怪的理论家在美国学界煽动一种自我沉溺的姿态,巴特勒所倡导的那种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全然不关心女性(特别是其他阶层、其他文化中的女性)现实的生存状况,只用对任何人来说都毫无价值的东西自娱自乐,因此将女性主义的社会—政治批评引入歧途。^②在纳斯鲍姆对女性的社会与政治地位、性与社会正义、女性身心健康与能力平等所做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她如何有意识地对女性主义的社会—政治批评实施一

^① Katarina Majerhold (2010), “Interview with Martha Nussbau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Studies* 3: 164—171, p. 164.

^② 参见 Martha Nussbaum (1999), “The Professor of Parody” (http://www.qwik.ch/the_professor_of_parody)。

种彻底的重新导向。例如，在《性与社会正义》中，纳斯鲍姆以所有人的平等尊严和平等尊重的思想为出发点，对女性的性别特征以及女性在现实世界中受支配的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捍卫和发展了一种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女性主义。她反对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看作是所谓的“自然”事实，认为这种状况完全是无视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的结果；另一方面，她也不同意很多女性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提出的一种批评，即认为自由主义对个体的规范优先性的强调导致了一种利己主义(egoism, 或者更确切地说，自由主义使个体偏爱成为一种对其他人没有深层需要的人)，并进一步表明同情、关怀和爱如何能够成为自由主义的本质要素。在她看来，女性服从于他人，为了某个更大的社会群体(例如家庭)而牺牲自己福祉的倾向在很多情形中都是道德上值得赞扬的，但不应该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倾向往往是在不公正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反映了社会并不充分重视女性的福祉。然而，重要的是，女性在保持自己性别特征的同时应当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认同的生活方式。因此，纳斯鲍姆实际上并不倡导那种全然抹除性别特征的极端的女性主义。例如，她论证说，在两性关系中，只要双方都能做到平等尊重，被当作“性对象”(被当作一种“不可思议的事物般的存在”)就未必是道德上有害的，反而可以是一件人性化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由此而意识到自己不是自给自足的，^①而承认这一点不仅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好的人类生活的一个根本标志——她在《善的脆弱性》中对此提出了论证。由此可见，纳斯鲍姆与保守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以及自我沉溺的女性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不仅体现在她试图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中捍卫一种伦理普遍主义，竭力维护理性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且也体现在她对世界主义的伦理观念的根本承诺中，她对社会正义和社会批判的思考也因此而变得更为深刻和广泛。上面提及的这几件事情，尽

^① 参见 Nussbaum, “Objectification”, reprinted in Nussbaum (1999), pp. 213—239.

管只是纳斯鲍姆学术生涯中的一些花絮,却有力地揭示了她自己对待学术的态度以及对学术与公共生活之关系的理解。对她来说,学术思考和写作若不与对人类生活的现实关怀和情感投入相结合,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必将堕落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或者成为一种猎取个人名声的手段。

纳斯鲍姆是一位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哲学家,而且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她不仅竭力为这样一个理想提供哲学上的说明和辩护,也试图在公共生活中倡导和实践这个理想。尽管她的哲学论著涉及很多方面,但是,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她的哲学工作的本质,我们可以说:纳斯鲍姆试图对人性提出充分的理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和捍卫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一种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与某些具有类似观念的学者不同,她并未低估人性的复杂和多样。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她对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论述中。她从斯多亚学派那里继承和发展了一个核心观念:情感在本质上是认知的,体现了我们对世界(包括他人)的判断,因此我们不能将情感及其各种表现形式从人类生活中分离出来,更不能像理性主义哲学家那样将情感完全看作是理性的羁绊。情感不仅是人性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且情感依恋也是好的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个思想不仅构成了《善的脆弱性》的一条论证主线,也是纳斯鲍姆后来发展其能力理论和正义学说的一个思想基础,在其后来的相关著作如《正义的前沿》和《政治情感》中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和落实。不仅如此,这个思想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纳斯鲍姆为什么在其哲学论著中频繁地采用文学作品并加以详细讨论。在她看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叙事性论述能够在读者一方产生同情和移情,因此能够让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处境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感悟,从而以这种方式促进公民意识和对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感受。“只有用叙事艺术家特有的语言和形式才能贴切而精确地阐明某些关于人类生活的真理。就人类生活的某些要素而论,小说家的艺术措辞就像警觉的有翼天使,在日常言语或抽象的理论话语的迟钝措辞变得盲目、反应迟缓的地方仍保持敏锐,在它们变得呆滞

和沉重的地方仍自在轻盈。”^①由此，我们也不难明白，她为何格外强调情感教育在人文科学和通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不过，尽管纳斯鲍姆继承了斯多亚学派的情感理论的一大核心主张，即情感本身就包含认知的要素，但是她并不接受他们对情感所提出的最终结论，即不加管制的情感将摧毁一个人的道德品格，因此，就情感依恋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为人所控制而论，我们应该通过有意识的训练而令自己彻底摆脱情感和情感依恋。纳斯鲍姆之所以拒斥这个主张，是因为她坚持认为，动物性是人性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而情感同样是我们的动物性存在的一个规定性特征。这个思想其实就是她在《善的脆弱性》试图论证和发展的一个核心论题。纳斯鲍姆在本书中对人性和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学术兴趣的发展，为她后来的哲学写作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她后来的很多论著都旨在进一步思考和发展《善的脆弱性》的一些论题。实际上，在《善的脆弱性》第一章以及后来的“修订版序言”中，纳斯鲍姆已经对本书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结构做出了详细解说。鉴于此，下面我们将仅重点阐述两个基本议题：第一，她撰写本书的思想背景以及她对人性和人类条件所提出的理解；第二，这一理解如何影响了她后来对正义的思考和设想。

二

《善的脆弱性》是纳斯鲍姆的成名作，在撰写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动物的运动》的博士论文期间，她就开始构思这部著作。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正是她在这个期间的生活经历、她对古希腊悲剧、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令其产生了撰写《善的脆弱性》的最初冲动。

在纽约大学求学期间，纳斯鲍姆在希腊语写作课上结识艾伦·纳斯

^① Martha Nussbaum, *Love's Knowledge: 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5.

鲍姆并与他相爱，大学毕业后两人就结了婚。艾伦·纳斯鲍姆毕业后赴牛津大学研究古典语文学，1974年获得比较语文学方面的文凭后去哈佛大学研究语言学，并在1976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耶鲁大学担任了十年教职（1975—1985年），1985年转赴康奈尔大学任教。作为印欧语言学家和古典语文学家的艾伦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玛莎·纳斯鲍姆在婚后也皈依了犹太教，因为她觉得，犹太教就像戏剧一样，具有强烈的情感表现力。两人在1987年离婚，育有一个名叫“蕾切尔”的女儿（本书就是题献给她女儿的）。这场婚姻的破裂以及纳斯鲍姆撰写《善的脆弱性》的动机都与她在这个时期的个人经历和体验具有一些可辨别的联系。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并备受父母宠爱的纳斯鲍姆在进入大学之前未曾体会过人类生活的脆弱。但是，她的婚姻令她首次有了这种感受：纳斯鲍姆的父亲对犹太人持有偏见，认为犹太人粗俗不堪，因此不赞成这场婚姻并拒绝参加婚宴。纳斯鲍姆一下子从父亲眼中的宝贝女儿变成叛逆的孩子。纳斯鲍姆在哈佛求学的那些日子，强调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的分析哲学仍然在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大多数哲学家闭口不谈与人类存在和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这种哲学研究风格令纳斯鲍姆感到格格不入——不只是因为她本来就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感召下进入哲学领域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才是根本问题），也因为分析哲学所吸引的是一群以男性为主的“咬文嚼字”的研究者，因此就助长了一种“女性做不了哲学”的偏颇心态。这种将性别差异与角色定位联系起来的心态也出现在纳斯鲍姆的婚姻生活中。在1972年，当她怀孕的时候，她刚刚被选为久负盛名的哈佛学者学会（Harvard's Society of Fellows）成员。她寻思其他学者会这样看她：“我们让一个女人进来了，但她做了什么呢？——出去怀了一个小孩。”更有甚者，在当选哈佛学者学会成员时，一位享有声望的古典学家给她写了一封祝贺信，其中说道，既然“female fellowess”（女学者）这个说法并不合适，那就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一位女性成员。然而，谙熟希腊文的纳斯鲍姆很清

楚：既然希腊语中与男性成员相对应的词是“hetairos”，她就可以被称为“hetaira”，而后者在希腊语中并不是指“女性成员”，而是指受过教育的高级妓女。^①这种看待女性学者的另类眼光让纳斯鲍姆很不自在，因此下定决心要自强不息——甚至在临产期还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带进医院进行研读，以便让人们知道她仍然在工作。就像她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长跑习惯一样，纳斯鲍姆一生都在学术上不停“奔跑”，大概不只是因为研究和写作的时候，她才会觉得自己作为女性更有安全感、更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因为她想证明，女性也能在学术上做出卓越的贡献。纳斯鲍姆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她离婚的理由，不过，她明确地意识到，艾伦理所当然地认为照看孩子是女性的义务，与此相比，女性对自己职业目标的追求应当退居次要地位。她后来写到，甚至“在善良正派的男人当中，还是有些人没有为生命的惊喜做好准备，在碰到照看小孩之类的问题时，他们的美好意愿就搁浅了”。作为女性，纳斯鲍姆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道德冲突的存在，并因此而拒斥康德的一个核心观念：只要有了道德上好的意愿，就绝不可能陷入在伦理上遭受危险或受到威胁的境地。按照纳斯鲍姆自己的说法，她在哈佛的终身教职申请之所以被否决，并不是因为她在学术上不够出色，而是因为她作为女性，不仅直言不讳，且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女性魅力，因此令周围很多人对她“极为厌恶”。

看来，纳斯鲍姆在求学时期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令她产生了两个重要认识：第一，在面临广泛地加以设想的道德冲突的情形中，任何选择都是有道德损失的，对善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也必定是脆弱的；第二，女性在其追求职业理想的过程中并未得到充分尊重，她们所做出的贡献也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她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屈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不公正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两个认识都在《善的脆弱性》中留下了印

^① Martha Nussbaum,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7.